

安徽凤台县中心村调查

许宏业

国内外许多关注中国的人,出于各种目的,不断地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停滞?中国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发生逆转?”安徽凤台县中心村的农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洗礼的中国农民决不允许时光倒转,他们将汇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无反顾地坚定地走下去。

作者:许宏业,女,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安徽凤台县中心村的社员们为了所谓的“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成年累月地批来斗去,却始终没能摆脱逃荒要饭的悲惨命运。如今,经历了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初步摆脱贫困之后,中心村的农民终于觉醒了,当他们因种种原因再度陷入贫困境地之后,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默默地忍受了,他们一次次写信向有关部门揭发问题,成群结队地上访告状,1989年成了村民们的“告状年”。他们的举动引起了中央及省委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各级负责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中心村重又汇入改革开放的大潮,短短几年便挖掉了穷根,成为淮北平原上的一面致富的旗帜。

一、历史的回顾

凤台县中心村地处淮北平原,居于淮河与西淝河交汇点。该村共有6个自然村,15个村民小组,3017人。有耕地3518亩,人均占有1.16亩。历史上旱、涝灾害频仍与人多地少构成了中心村的基本特点,加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推行“以粮为纲”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农民们被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生活极其贫困。据笔者1993年3月对69户抽样调查统计,直到1978年,中心村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只有89.8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心村开始走上改

革之路。然而这里的改革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大体经历了一波三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84年,改革的大潮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能人朱威来推上了中心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他带领全体村民一门心思抓好科学种田,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在两年内基本解决了村民的吃饭问题。1983年开始改变单一农业的经济结构,发展经济联合体。朱威来邀集9户农民组成“中心村经济联合体”,承包了因严重亏损濒临倒闭的毛集乡办轮窑厂。朱威来担任股东代表,从银行贷款3万元,10户农民每户集资2000元,5万元起家,10户人家拼出命来苦干一年,不仅救活了轮窑厂,而且当年每户分红2000元。朱威来发誓要彻底改变中心村的贫困面貌,带领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一方面将股份制不断完善,一方面广泛吸收村民入股,轮窑厂由原来的10股一下增加到132股,股金达百万元以上。中心村以轮窑厂为基础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建立了小型建材总厂并发展了7个合作企业。中心村从一部分村民率先致富开始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阶段从1984年至1991年,在中心村初步摆脱贫困之后,一些人出于私利,纠集在一起,将朱威来排挤出领导班子。中心村的经济发展刚刚有些起色就失去了带头人,一方面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少数掌握领导权力的人乘机贪污腐化,大吃大喝,肆意挥霍中心村村民的血汗。他们不仅搞垮了集体企业,还大兴摊派,把手伸进了农民的腰包。几年内中心村人均摊派

最少时达 84 元,最多时达 113 元。刚刚开始脱贫而一部分农民还只停留在温饱水平,在难以负担的盘剥下,中心村的村民又要重新回到改革前的贫困中。他们再也不能默默地忍受了,于是发生了本文前面所描述的告状上访。在中央及省委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注下,排除了重重阻力与干扰,挖出了窃取中心村领导权力的犯罪团伙,几年中这伙人贪污竟达 40 万元之多。处理结果 2 人被开除党籍、3 人留党察看,原党总支书记批捕在逃。1991 年元月,583 户村民联名上书,坚决要求上级批准,将朱咸来请回中心村,继续担任总支书记;第三阶段由 1991 年至今,中心村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村民们彻底甩掉了贫困枷锁,实现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实践证明朱咸来的确是个可以领导农村现代化事业的能人,在他被迫离村的日子自己经营的企业又很快地发展起来。重新担任党总支书记后,他无私地将自营企业中的 151.7 万元的固定资产奉献给中心村,当村办企业缺乏流动资金时,又再次拿出 50 万元作为村办企业的周转金。1991 年 2 月,中心村集体承包了已经停产 3 年的县办企业淮峰麻纺厂,只用了 3 个月时间整顿企业,麻纺厂又恢复了生产。在朱咸来的领导下中心村很快发展成拥有 12 个企业的“淮南市兴达实业总公司”,走上了农工贸一体化的发展道路。1991 年 4 月中心村被安徽省科委列为科技示范村。

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不断壮大经济实力的中心村,在 1991 年 7 月爆发的特大洪水面前经受了一场空前严峻的考验。灾害是严重的,工农业生产被迫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达 600 万元。面对水灾,中心村党组织领导群众抓紧抗灾,使一些企业恢复生产,并继续上了一批新项目。1991 年下半年,中心村共投资了 1300 多万元,引进科技人员 10 多人,用 7 个月时间先后建成了塑料编织厂、医疗器械厂、聚氨酯厂、调味品厂、鞋厂、饮料厂及加油站等 7 个新企业,全年创产值 1260 万元,获利税 131 万元。

1992 年,他们又调整了总公司内部机构,成立了工业、农业、商业、建筑建材业 4 个分公司,并进一步强化管理,使第一、二、三产业得到全面发展。截止到 1992 年底,中心村的村办企业共有固定资产总额 875 万元,流动资金 1140 万元,安排就业 1944 人,全年共完成产值 4355 万元,获利税 400 万元,分别比 1991 年翻了一番。

二、中心村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

今日的中心村村民从整体上已经告别了昔日的贫困。一进入中心村,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排排崭新的别墅式楼房,簇拥着一座具有现代化设施的豪华的白鹤宾馆,宾馆的后面是干净整齐的工厂区,这里已经变成令城市人羡慕不已的现代化新农村。这一切巨大变化都来自于改革开放,来自于更深层次的结构变革。

(一)改革中的经济结构

所有制结构

与全国各地农村的所有制结构一样,中心村解放以来经历了以个体(家庭)所有制为主的私有制阶段、以合作集体所有兼顾私有生产资料按股分红的过渡性阶段、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单一集体所有制阶段,80 年代开始出现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个体所有制共存的现象,近几年来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多样化的急剧变化,目前大体有如下几种形式:

①集体所有制。中心村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属于集体企业,如麻纺织厂、毛集轮窑厂、调味品厂等。此外还有若干种联营形式,例如,集体与个人联营,医疗器械厂就是由两位浙江人出技术和专利,中心村总公司出厂房、资金、设备、工人,联合兴办,所得利润双方各得一半;集体与国有单位联营,精密铸造厂是由中心村与新集煤矿双方各投资一半兴办起来的,中心村还与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经营兴办了服务于本地区的医院;集体所有个人承包,该村的废品回收站和加油站都是承包给村民,由村民经营,每年向总公司缴纳一定数量的承包费。

②联合体。目前中心村的各种联户企业有 32 个,一般由 2 户至 4 户合办经营,如各种商行、机械维修厂等。

③个体工商户(详细情况见“(三)农民的职业分化及其分层”)

产业结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 1981 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经营责任制之后,中心村改变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村民们将这一巨大变化形象地表述为“过去是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三个月赌钱,六个月跑着玩;现在是十天过年,二十天种田,十一个月从事二、三产业挣钱。”近几年,中心村的工农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①村办企业。1990年以前,中心村的村办企业规模较小,只有小油坊、木工坊、豆腐坊等几个手工作坊和一座由10户农民承包的轮窑厂。到1992年底,中心村已有一个实力雄厚的、管理人员达108

人,工人达1836人的兴达实业总公司,总公司下分工业、农业、商业、建筑建材4个分公司。其一、二、三产业比重见下表。

表1 1992年各类产业的产值及所占比重(村集体部分)

产业类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1992年产值(万元)	112	2090	1003	3205
占总产值的%	3.49	62.21	34.3	100

表1显示,中心村村办企业主要为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1992年,村集体的3205万元产值中,第二产业占62.21%,第三产业占34.3%。

②农户家庭经营。目前中心村除总公司少数上层管理人员因工作忙已没有时间种地而将责任田转包

外,其余98%以上的农户都种田,但是除部分农户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如劳动力年纪大,素质低,没有资金,技术等)从事单一农业生产外,大多数农户都兼营第二或第三产业。据统计,全村706户中,兼营第二、三产业的有424户(包括个体和联户)。详见表2。

表2 各类产业所占比重 单位:户 %

类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占 %	39.9	24.9	35.2

表2显示,目前中心村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户为总户数的39.9%,第三产业占第二位,为35.2%,第二产业为第三位,为24.9%。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户已占据多数。

据笔者抽样69户调查统计,1992年69户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为1068.9元,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占50.1%,居三类产业收入的首位,而在农业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中的64.4%。详见表3。

收入结构

表3 1992年69户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

	种植业	养殖业	手工业	农产品加工	建筑建材	运输业	商业	缝纫	从医	教育	村联防队	工人工资	干部工资	合计
人均收入(元)	344.8	190.6	30.4	74.1	37.6	81.6	161.4	3.8	11	6	17.4	69.8	40.4	1068.9
%	32.3	17.9	2.8	6.9	3.5	7.6	15.1	0.4	1	0.6	1.6	6.5	3.8	100

上表说明两点:第一,69户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在1068.9元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为935.3元,占87.5%,来自集体经济中的为133.6元,占12.5%。第二,农户中的收入主要来自第一产业,人均均为535.4元,占全部收入的50.1%,来自第二

产业的为275.7元,①占25.8%,来自第三产业的为257.8元,占24.1%。

① 其中包括来自村集体发给干部、教师的工资。

(二)变迁中的家庭

①家庭人口·家庭人口是反映家庭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据统计,1992年底全村共有3017口人,706户,户均4.27人。又据笔者对69户农民家庭调查统

计,1992年69户共有318人,户均4.6人。

②家庭类型·据对69户农民家庭统计,核心家庭占的比重最大,占71%。见表4。

表4 家庭类型 单位:户·%

家庭类型	夫妇家庭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隔代家庭	其他家庭
户数	2	49	12	1	5
占%	2.9	71	17.4	1.4	7.3

③家庭功能。在人民公社时期,家庭只有组织消费、生活和赡养的功能。实行联产承包后的农民家庭,还恢复了生产经营和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功能。于是我们看到农户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而又具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功能后,家庭

之间的差异增大了,家庭经营类型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心村只有清一色的“社员户”,现在有农业户、兼业户、专业户、个体工商户、雇工户等等。

④家庭收入。据对69户农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收入逐年增加。解决了温饱,走上了富裕。

表5 1978~1992年69户农民家庭收入

年份	1978	1980	1984	1988	1990	1992
收入(元)	89.3	138.3	591.7	744.4	958.9	1068.9

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1978年,该村人均收入89.8元,最高人均收入户(180元)是最低人均收入户(35元)的4.1倍。1992年该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068.9元,最高人均收入(3107元)是最低人均收入(365元)的7.5倍。(总公司上层管理人员不在统计之内)。如果把总公司上层管理人员和各工厂负责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与人均收入最低的农户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有一位承包集体企业的厂长告诉笔者,1993年,他们家的人均纯收入将在万元以上。所以,企业管理者与工人收入悬殊很大。

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69户人均消费由1978年的87.56元上升到1992年的968.3元,增长10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80年以前,农民只能维持生存,谈不上享受。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在食品消费方面,猪肉、鱼、蛋、水果、食糖、烟酒、茶和副食品的消费占的比重逐渐增大,食品质量也有较大提高。据对69户调查,1992年同1984年比较,猪肉,鱼蛋,水果,食糖的消费量分别增长1.36倍,1.58倍,15.4倍和2.8倍。特别是近两年,烟、酒消费和人情往来费用增长很快,占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详见表6。

⑤家庭消费。改革开放后,该村农民生活消费水

表6 1992年69户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情况 单位:元·%

种类	食品	衣着	燃料	用品	烟酒	人情往来	孩子读书	生产性支出 ^①	合计
数量	436	91.38	27.67	17.54	89.5	107.32	64.61	107.28	968.3
占%	47.8	9.4	2.9	1.8	9.2	11.1	6.7	11.1	100

注:①指种养业人均支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户人均消费中,烟、酒支出几乎与衣着支出持平。人情往来支出和人均生产性支出相等,都占全年人均支出的 11.1%。据农民介绍说:“烟、酒消费增加只是近两、三年才出现的,因为近两、三年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农户家中用钱也比过去方便了。”

在农户住房消费方面,1978年,全村农民每户平均居住房屋只有 9.6 平方米,1993 年人均住房面积为 15.01 平方米。在 69 户中,目前住草房的 14 户,占

20.1%,住瓦房的 55 户,占 79.9%。其中 14 户的草房分别建于 50 年代(1 户)、60 年代(7 户)、70 年代(6 户)。改革开放后,80%的农户都盖了新房,其中 1978~1980 年盖的是草房(4 户),1980 年以后盖的都是瓦房,其中有 2 户楼房,3 户平房(准备以后加盖楼房)。1978~1992 年底,户均造房费用是 414 元。

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农户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详见表 7。

表 7 1993 年 69 户家庭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单位:个

电风扇	收录机	黑白电视机	彩电	洗衣机	电冰箱	收音机	缝纫机	组合家具
81	35	55	4	4	3	4	2	1

(三) 农民的职业分化及其分层

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并且带来了农民阶级内部分层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中心村的农民在职业的分化上,其规模与速度虽然不能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相比,但在安徽省仍属于较突出的典型。目前,该村的农民大致可分为如下数种不同的职业层次:

① 企业管理者。随着村办企业的逐年增多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该群体的数量亦逐年增加,到 1992 年底已有 101 人(男 73 人,女 28 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 6%,分别担任不同层次的领导。企业的上层管理者共计 7 人,分别为总经理朱威来、副总经理沈多认、朱克谦、李士武以及主管会计史国怀等。7 人中除 1 人为 1992 年才来到总公司任职者外,其余 6 人在 1991 年以前都是合伙企业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他们都有了相当数量的积蓄,并在凤台县城购置了楼房,其家属基本上都住在城里,有的为子女购买了

城镇居民户口。他们往返城乡之间依靠总公司派车接送;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包括总公司办公室成员及各企业的正副厂长,共计 42 人。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公司的内外各部门间的协调,正副厂长担任生产的组织、管理及销售等。总公司向厂长下达产值及利税任务;企业的下层管理者包括各企业的会计、供销员、保管员、统计员等,共计 52 人。负责企业的财务及产品销售等。

企业管理者群体是中心村里素质最高、工作能力最强、有门路善经营的一批能人,也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最高者。他们的年收入主要依据其经营企业的效益评定,一般年收入在 5000 元至 10000 元之间,在中心村他们是高收入层。

笔者对企业管理者阶层中的 71 位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来源地等情况见表 8—11。

表 8 71 位管理人员的年龄结构

年 龄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59 岁	60 岁以上	合 计
人 数	29	25	12	3	2	71
占 %	40.8	35.2	16.9	4.3	2.8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群体,青年人占 76%,平均年龄 32.2 岁。

表 9

71 位管理人员的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合计
人 数	3	35	26	3	4	71
占 %	4.2	49.3	36.6	4.2	5.7	100

表 10

71 位管理人员的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群 众	合 计
人 数	20	17	34	71
占 %	28.2	23.9	47.9	100

表 11

71 位管理人员的来源地

来源地	本 村	本乡外村	本县外乡	本 市	外 省	合 计
人 数	36	16	9	5	5	71
占 %	50.7	22.6	12.7	7.0	7.0	100

在这批管理人员中,除本村人外,还有从浙江、江苏、淮南市、凤台县城等地聘请来的技术人员,有的还当了厂长。

②村级管理者。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党总支部委员会成员。该村共有 95 名党员,组成一个党总支,下辖企业支部和农业支部。朱威来任总支书记,两位总支副书记李士武、沈多认分别兼任农业支部、企业支部书记,此外还有两位总支委员。村委会和农业支部共有 16 名成员,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 0.96%。朱威来兼任村委会主任。村级管理者群体中除妇女主任(兼管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助理员和出纳会计等 3 位为女性外,其余全是男性。16 名成员中共有 14 名党员、2 名团员;其中年龄最大者 54 岁、年龄最轻者 24 岁;文化程度为小学毕业 2 人、初中毕业 9 人、高中毕业 5 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者占 87.5%。村级管理者群体是该村政治、社会生活与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者,是村集体企业、集体财务及土地和水面所有权的代表者,也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这一层次每人月工资一般为 100 元,但年终奖金相差较为悬殊,最高为 1 万元,最低只有 100 元,一般在 500 元至 700 元之间。分配原则主要依据其担负职务高低、工作量大小、工作能力强弱及工作态度如何

等。

③农民工。指常年在村办企业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约占全村劳动力的 10%。他们吃、住在家,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多数还没有结婚。据对 69 户农民家庭从业结构的调查统计,在 188 个劳动力中,在村办企业里做工的有 21 人,占劳动力的 11.1%,其中男 11 人,女 10 人。他们的年龄在 19~25 岁,平均年龄 21.3 岁;他们的文化程度是:高中 2 人,初中 10 人,小学 9 人。他们的月收入不等,最低的 80 元,最高的 150 元,平均月收入是 111.6 元。

④外来工。中心村各企业中的工人,约有 80%,即 1500 人左右为外来工,年龄在 18 岁至 25 岁之间,80%以上未婚。外来工分为两类,一类为本乡外村的农民,居住地距中心村较近,上下班骑自行车。另一类是来自较远地区的农民,大都吃、住在工厂,村里免费为其提供宿舍。在分配上,工厂都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得,一般每人每月 100~120 元,技术熟练的工人一个月 150 元,刚进厂的工人,一个月 60~80 元,个别刚进厂的学徒工每月只 50 元(极少数)。这些人在中心村劳动,享受中心村青年一样的待遇,中心村人不歧视他们。表现好的,能干的同样会受到重用。

⑤智力劳动者。指从事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工

作的劳动者,共有47人。

教师 中心村有一所建于1983年的5年制村办小学,共有学生507名,分为8个班。该校现有教师20名,其中公办教师12名(男9、女3),民办教师3名(男2、女1),代课教师5名(男3、女2);有4名党员,7名团员;文化程度为中师毕业9人,中专毕业5人,大专毕业1人,初中毕业4人,高中毕业1人;其职称为小教1级3人,小教2级5人,小教3级7人,5名代课教师没有职称。

教师的工资收入情况:12位公办教师平均每人月工资为191元,3位民办教师平均每人月工资为125.6元,5位代课教师平均每人月工资为92元。20位教师的平均月工资是156.4元。

医生 中心村共有24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其中有17人为国家正式职工,属于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心村与该医院合办了一家医院,由淮南市第二人民医院出设备、技术,中心村出房屋、床、桌等。17名来自淮南市二院的人员有2人有高级职称,其余大部分有中级职称。中心村有5人在医院内工作,其中1人任副院长,曾在凤台县某厂职工医院工作。此外该村还有2人从事个体医疗卫生工作,1人摆药摊,1人看病。

科技人员 中心村有两位农业技术员,都为农技师,文化程度都是高中毕业,负责全村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此外还有1人为个体兽医。

⑥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该村从事个体工商业的人数较多,因为这个村有部分农户就居住在集镇上,有的农户家离集镇很近,最远的也不过二、三里。所以,到1993年3月底止,全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有424户,近千人。他们中,住在集镇上的都有一个门面,领了个体执照,常年从事个体工商业。在424户中,经商的有119户。他们中有卖布的,卖小百货的,开商行(又叫交易所)的,如米行、牛行、猪行、鱼行等。有的还从事粮食贩运。还有56户为运输专业户,他们中除少数户有货车、小四轮外,多数用的是手扶拖拉机(这个村95%以上的农户都有手扶拖拉机)。

这一层次的劳动者收入悬殊较大,有的1个月只能挣80~100元,如打草包,做豆腐,泡豆芽卖的;有的每月能挣100~150元,如榨黄豆油的、做木工的;有的每月能挣500~600元,如跑运输的,制海棉瓦的等。从总体上讲,这个职业层次的人经济收入在村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从“看不惯”到“学着干”,所以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逐

渐提高,他们很辛苦,不善于经营或者没有经营经验的往往要亏本。这是一个处于动荡之中的不稳定的阶层。他们怕政策变,怕被偷被抢,对乱收费、乱罚款以及有些地区或部门管、卡、压极不满,希望有个稳定、连续的政策,安定、良好的社会秩序,比较宽松的经济、社会环境。

⑦农业劳动者。中心村共有706户,其中424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收入以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兼营农业),家中没有经营第二、第三产业的只有282户,占全村总农户的39.9%。据随机抽样调查的69户,共有劳动力188人,从事农业的60人(其中种植业35人,林业2人,牧业23人),占69户劳动力的31.9%。有的农户家庭虽没有搞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家中20岁左右的儿子、女儿、媳妇在村办企业中做工。也有的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虽没有到工厂做工,但农闲时搞点其他副业,有的一年搞几次长途贩运,有的做点临时工,因此,真正单纯搞农业,什么副业也不搞的人在中心村确实不多,除非是些年老体弱的男劳动力和中老年妇女。从对69户农民家庭的调查统计,共有农业劳动者60人,其中男性39人,占65%,女性21人,占35%;男性中年龄最小的30岁,最大的60岁。30~40岁的10人,占35.6%;41~50岁的17人,占43.6%;51~60岁的12人,占30.8%。女性中,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52岁。20~30岁的6人,占28.6%;31~40岁的7人,占38.1%;41~55岁的7人,占33.3%。在这60名农业劳动者中,文化程度为初中文化的11人;小学文化的14人;文盲35人,其中女性文盲占72.4%。

在中心村的各个阶层中,农业劳动者是一个劳动条件最苦最累而收入最低的阶层。1992年,他们人均年收入为580~800元。

⑧外聘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层。村办企业中的科技人员约30人左右。多数是从国营工厂或科研单位聘请来的或自愿到中心村落户的。他们绝大多数事业心强,有开拓精神,有比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特长,能吃苦耐劳,忘我工作。

上述几个职业层次不是固定不变的,尤其是在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及所处地位正处于经常性的分化与重组之中。

(四)农民观念的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村办工业的崛起,中心村由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化,社会变迁给农民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影响。

目前,中心村农民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动荡之中。

知识观 笔者与许多村民进行了座谈,当问到他们“致富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多数农民回答:“不懂技术是最大的困难。”事实正是如此。近两年,随着村办工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本村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只好从外村、外乡、外县、甚至外省引进了一些科技人才。由于文化素质低,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庭经营搞得不够好。例如:该村是产粮区,又是稻谷加工比较集中的地方,本村有20家稻、麦加

工厂,米糠、麦麸特别多,价格也便宜。而鸡、鸡蛋却比北京贵得多。但是全村没有一个家庭养鸡场,村集体也没有养鸡场。有的农户只养了几十只鸡,还常常死于鸡瘟。主要原因就是不懂养殖技术,不会防治鸡病。多数还没有富起来的农户都是因为文化素质低,阻碍致富。因此,多数农民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知识、有文化,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农民甚至把文化程度作为选择儿媳、物色女婿的一个重要条件。66位农民对您希望您的子女上学上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作了如下选择:

表 12 66 位农民对孩子上学的希望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	出国留学	能上就继续上
人数(人)	0	1	8	20	5	2	30
占 %	0	1.5	12.1	30.3	7.6	3	45.5

从上表可以看出,98%以上的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高中及其以上程度的教育,在回答“能上就继续上”一栏中他们解释说,只要孩子能念得上去,花多少钱都让他继续念下去。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以每人6000元的价格给孩子买了县城户口,不惜以高价让孩子进县城重点学校学习。农民中有72.5%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知识型人才。掌握技术“吃得开”,“善于经营吃得开”已成了该村农民的一种共识。

“多子多福”观念渐趋淡化 随着非农业生产

的发展,中心村青年已像城市青年一样,每天在企业里上班,下班后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终日忙碌,深感精力与时间可贵,因而不愿多生儿育女,不愿因此增加精神与经济上的压力。加上计划生育工作近年来抓得较紧,以及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大家庭被小家庭所代替,婆婆对媳妇施加的压力相对减弱了,因此,目前在中心村,有不少青年妇女做到了一胎化,尤其是20岁左右的未婚男女工人,思想更加开放,他们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和一般中老年农民形成了很大反差,见下表13。

表 13 81 位青年和 69 位中老年农民对计划生育的看法

	一男		一女		一男一女		两男		两男一女		只要一个男女一样		不要	
	青年	中老年	青年	中老年	青年	中老年	青年	中老年	青年	中老年	青年	中老年	青年	中老年
人数(人)	5	5	7	0	25	58	0	0	0	0	43	6	1	0
占 %	6.2	7.2	8.6	0	30.9	84.1	0	0	0	0	53.1	8.7	1.2	0

上表显示,青年人有53.1%人认为只要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还有个别男青年提出不要孩子,而中老年农民,他们有84.1%的人认为,在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如果只有一个女孩,长大后出嫁了,家里只剩两个老人,什么事也不方便,所以他们认为,在农村一

对青年夫妇还是要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好。尤其该村少数老太太,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在她们的思想里还根深蒂固。总希望儿媳为她们生个孙子。

土地依赖意识逐渐淡化。1981年该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分户承包,农民生产积极性高

涨。但是,随着村里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有头脑、有手艺、有技术的能人,长期经营非农产业,已经没有精力再耕种土地了,他们把承包地转包给了亲戚或朋友种。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到处有挣钱的机会,很多人不再单纯依靠土地那微薄的收入,而从事第二、三产业。到1992年底,全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户已占全村总农户的60%,农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感情日益淡薄。

三、农民呼声

为了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我们对中心村的部分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还组织了座谈会,进行了入户访谈,笔者将农民们的意见与要求归纳如下:

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反映 对69户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认为联产承包制好的有67人,占总数的97.1%,有2人回答“说不清楚”,占总数2.9%。中年(40岁)农民李方正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们有了自主权。我家6口人,除了种地外,农闲时还做小生意。1992年,我家人均收入1342元,比1978年的120元增长了10.2倍。我们感谢党,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农民普遍要求改革开放政策长期稳定,67岁农民李在业说:“土地承包到户对我们来讲是件大好事,我对现行政策很赞同,希望政策不改变。”

对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反映强烈 农民们普遍认为“种田划不来”。在中心村当清洁工的风台县夏集乡康庙村的47岁农民刘富红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他家6口人,种了11亩地,1992年收获稻子10450斤,价值2299元(每斤0.22元),而当年农业总支出和上缴各项费用高达1764.2元,纯收入仅为534.8元,平均每亩地收入48.6元。他所列的支出

项目包括:化肥334.4元、农药55元、种子110元、柴油83.6元、投入劳动力308元(按44个劳计日、每工7元计算),共计891元,平均每亩投入81元;上交国家农业税和地方各种摊派包括:稻子1700斤,按每斤0.22元计,共为374元。小麦1080斤,按每斤0.24元计,共为259.2元。交水利兴修款210元、计划生育费30元(他家无育龄妇女),诸项合计为873.2元。全年各种支出为1764.2元。刘富红反映,他所在的村子共有40多户农民,有耕地290多亩,1992年撂荒达40多亩,占全部耕地15%。刘还表示,如果粮价有所提高,而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得到控制,种田划得来的话,他是不会出来打工的。

中心村粮行经理朱克学说:“目前粮价太低,1992年秋,我们这里稻子上市时,每斤市场价0.19元,农民需要钱买化肥,稻价那么低,忍痛也得卖,当时5斤稻子换不回1斤柴油。越是经济困难的农民,越是吃亏。”在和他们个别交谈中,有朱长群等7位农民要求国家提高粮食价格,降低农用产品如化肥、农药、柴油等价格。

对目前党风问题和社会风气问题的看法 农民对一些基层干部的贪污、受贿,尤其是大吃大喝风气极其反感,对于社会治安问题也是忧心忡忡。许多农民向我们反映:“现在到处都有受贿现象,没钱办不成事,这不仅败坏了党风,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影响了干群关系。”在入户访谈的69位农民中,有近半数农民要求国家采取措施搞好社会治安,他们列举了农民外出做生意遭到拦路抢劫的多起案件,被劫款项少则数百,多则数千。

对农村收入差距拉大的看法 调查结果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在调查中提问“您对目前农村收入差距拉大有什么看法”,69位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如下:

表 13 69位农民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看法

看 法	满 意	较满意	不 满 意	很 不 满 意	合 计
人 数(人)	53	14	1	1	69
占 %	76.8	20.2	1.5	1.5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对目前农村中收入差距拉开还是能够接受的。对拉开收入的看法似乎不完全决定于本人收入的多寡,例如:中心村副村长朱克

永,1992年,他家农业收入和开饭店收入合计12400多元,人均年收入3500多元,他在交谈中说:“目前农村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今后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农

村中,家庭经济收入越低越贷不到国家的款,越富的人越能贷到款”。相反,有的收入低的农户,对收入差距拉大却较满意。如朱洪树,家中5口人,妻子(种菜)、儿子(在村办企业做工)、小儿子(收养的才3岁)、哥哥(73岁),种3.2亩地,平时还种些蔬菜上集卖,1992年家庭人均纯收入才515元。在个别交谈中,

他说:“国家、政府对谁都一样,凭本事赚钱,自己没有本事,又能怪谁呢?”

对农村干部和群众关系的看法 为了了解农村中干群关系,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农村中(不局限于本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原因是什么?”

表 14 农民对农村中干群关系的看法^①

	好	较好	一般	紧张	不了解	合计
人数(人)	5	3	4	46	11	69
占 %	7.2	4.3	5.8	66.7	20	100

注:主要指外村,因为中心村农民提留轻,干群关系较好。

在和农民个别交谈中也有许多农民反映目前农村中基层干部和一般农民群众关系比较紧张,笔者进一步问他们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归纳起来如下:

①农民负担太重。和69位农民交谈中,有29位(占42%)农民说:“提留太重(指外村),是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朱兆田说:“干部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搞计划生育),这些在客观上加剧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

②一些基层干部工作长期不见成效,不仅农民的生活难得提高,各种名目的负担却不断增加,农民的怨气很大。毛集乡梁庙村农民梁新樟(30岁)说:“有些基层干部领导不得力,死脑筋,不懂得组织农民搞第二、第三产业。最使农民生气的是,拿群众的钱、吃喝、贪污、挥霍。自己能力不强,村里有能力的人,他们又不重用,使得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农民收入低、负担重。”

③干部和农民群众贫富差距拉大。在和农民交谈中,有7位(占10.1%)农民认为:目前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与收入悬殊、贫富差距拉大有关系。有些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村,群众生活不好,住草房,而少数干部吃

得好,住楼房,群众有意见。

④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的干部当群众需要他们来解决问题时,他们不帮助群众解决。68岁农民朱咸亮说:“提留重,农民没钱交,就扒农民的粮食。”中心村村长朱德良说:“有的村干部和群众关系不好,与干部不能帮助群众办实事有关系,当群众有困难时,他们不能及时帮助解决。”因此,农民要求各级领导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50岁农民朱长启说:“应加强对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教育,要求我们的干部树立起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观念。”

凤台县中心村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是党的改革开放与富民政策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农民摆脱形形色色精神枷锁,不断地争取自我解放的结果。改革被称作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其深刻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的再一次觉醒,没有中心村村民的不屈不挠的奋斗也就没有中心村的崛起,历史将进一步证明,没有农民的觉醒也便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王 颀